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

卢凌宇

内容提要: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至少可以遵循两条路径:一是“核心问题驱动路径”;二是“观念引导路径”。核心问题能否推动中国学派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性质。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不易受外交政策影响、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经验性问题而非规范性问题。不仅如此,该路径可能还必须回应“泛目的性”的质疑并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观念则包括关于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们是人性的部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同构性,从而赋予了“观念引导路径”以较强的自然演化属性。两条路径虽然取向不同,但可以并行不悖地共同促进中国学派的生成。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中国学派 路径选择 核心问题 观念

引 论

高度重视理论的本土原创性是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一个显著特色。^①这个倾向至少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②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国视角”和“中国学派”等说法陆续出现。2004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创建中国理论、构建

^① 本文把国际关系学定位为社会科学,以区别于国际关系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理论等同于国际关系学,所以两者在文中交替使用。

^②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349页;王建伟、林至敏、赵玉梁:“努力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6年第9期,第1-7页;谢益显:“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内容之我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9期,第34页。

中国学派”的倡议。^①如果说中国视角是“从中国的立场、利益、历史文化等视角思考与研究国际问题,从中国的问题意识思考国际问题”,^②那么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既是中国视角的理论结晶,又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前提。相对于中国特色和中国视角,中国学派强调理论的“体系性和流派特征”,^③“在主观上更自觉,在内容上更充实,较之从前更有底气”。^④

科学的学派(school)是一个特定的研究群体,群体成员“研究旨趣相似,理论导向相同,思想倾向相仿,学术风格相近”。^⑤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并不总是赞同“学派”这个提法。一方面,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前言中向“明尼苏达学派”(the Minnesota school)和学派之父雷蒙·杜瓦尔(Raymond Duvall)表达了谢意,另一方面,温特坦言不能确定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其他成员是否会承认存在这么一个学派。^⑥尽管如此,社会科学中的学派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对知识的增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学派是激活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学派之间的互动引发理论创新,学派对于传承学术精粹,凝炼学术传统,铸造学术辉煌,造就学术大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⑦

以国家来命名学派在社会科学史上不多见,^⑧但并非没有,例如国际关系学中著名的“英国学派”和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国内不少国际关系学者支持“中国学派”这个提法,主要的分歧体现为对中国学派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很多学者否认

① 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6页。

②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344页。

③ 同上。

④ 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第17页。

⑤ 俞正梁:“序言”,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⑥ 2007年2月8日,温特在给作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据我所知,还没人写到过‘明尼苏达学派’。我不能确定这个系的‘拥趸们’是否会承认他们是所谓‘明尼苏达学派’的成员。鉴于这种状况,如果你了解这个学派,除了采访当事人,可能找不到其他的信息来源了。”

⑦ 俞正梁:“序言”,《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2页。关于学派的作用,也可参见邓伟志、林明崖:《学派初探》,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序”,第1页;张家治、荆润川主编:《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学派》,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3页。

⑧ 社会科学中的学派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命名方式:一是制度化的学术中心或中心所在地(国),例如经济学的“剑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的“弗吉尼亚学派”和“布鲁明顿学派”;二是学派所在的(大)学校名,如政治学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国际关系学的所谓“哈佛学派”、“普林斯顿学派”,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后两者尽管声名显赫,但并没有系统的思想可以传世;三是研究的问题领域,例如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参见 William Mitchell, “Virginia, Rochester, and Bloomington: Twenty-Five Years of Public Choice and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Policy*, Vol.56, No.2, 1988, pp.101-119; 也可参见 William Mitchell, “The Old and New Public Choice: Chicago Versus Virginia”, in William Shughart II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Public Choic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pp.51-58。

存在单一的中国学派。^① 庞中英把中国学派视为“有中国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总称,并非指单一的一个学派”,因为在中国学派内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学派。^② 俞正梁则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取决于“不同学派的形成、切磋与争鸣”。^③ 也有学者对以国家来命名学派表示异议。阎学通认为,理论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上的排他性,所以美国三大理论的创建者就从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所谓的“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所谓学派往往指“系统性还不太完善的理论思想”,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思想具有国家或民族性。^④

关于“中国学派”内涵的争论固然为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的建设所不可或缺,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无疑是如何建设中国学派。^⑤ 在这个问题上,秦亚青教授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中,倡导并系统地论证了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驱动路径”。^⑥ 本文是对秦亚青教授这篇纲领性著作的深化和推进。本文潜在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对核心问题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阐述了“核心问题驱动路径”的特点和限度;二是尝试性地提出了与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观念引导路径”。在经验上,本文将通过核心问题和(共有)观念这两个视角,对正在形成中的建构主义的“中国学派”、“清华路径(学派)”和“上海学派”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一 学派何以生成: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

从逻辑上看,学派的生成有两条路径:一种是自然演化;另一种是人为建构。所谓自然演化,指学者按照自己的偏好去从事研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学术交集;人为建构,则事关学术共同体的领导和组织,以及如何处理与行政机构的关系,有着较重的权力政治痕迹。支持自然演化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理论建构“无法以机械的方式通过拼凑、组装事先想当然的零部件的途径来完成”,因此,学派“不是自封的,而是被

① 国内学者也有反对以国家来命名学派的,例如张晓明指出,用英国学派来比附中国学派是不恰当的,因为英国学派严格地说应该叫英格兰学派,它不能代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国际关系思想,参见张晓明:“英国学派还是英格兰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78-80页。

② 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第20页。

③ 俞正梁:“序言”,《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2页。

④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293页。

⑤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66页。

⑥ 同上,第165-176页。

承认的”。^①王逸舟也指出:“中国……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②王逸舟在此处虽然讨论的是特色形成,但这个观点也适用于学派生成,因为“特色”往往是学派的思想特征或标新立异之处。这些学者的观点符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等科学哲学家的知识进化观念。在波普尔看来,“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③库恩把科学进步比喻成物种适应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认为“科学发展必须被看做是一个从后面推动的过程,而不是受到前面拉动的过程——就像生物进化是从过去物种进化而来,而不是向什么物种进化而去”。^④库恩进而建议,如果用“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取代“按我们希望知道的去演进”,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消失。^⑤

苏长和等指出,独特的理论贡献是判断学派存在的主要标准。^⑥而所谓独特的理论贡献,必须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派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政治/国际关系学史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学术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形成某种派别,但他们努力推进自己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最后被学术共同体认可为学派。下文要大量论及的美国政治学的芝加哥(Chicago)学派和罗切斯特(Rochester)学派就是这样的先例。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演化与人为建构虽然遵循不同的生成逻辑,但两者并非针锋相对,而是存在交集。具体而言,一方面,自然演化并不意味着消极无为,而是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借助制度和文化环境,为学派的成长创造适合的条件。另一方面,建构主义者可以从自然演化的案例中吸取学派成长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学派建设的效率。所以,学派生成往往是人为建构和自然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学派生成的条件,国内外学者做了不少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贡献突出了共同信念对学派生成的重要性,而国内学者则提出了与之大异其趣的以核心问题来驱动学派生成的另一条路径。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学派的生成条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学派的生成被认为

① 苏长和、彭如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年来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第15-20页。

② 王逸舟:“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若干问题”,土柏咨询网,2004年4月29日, <http://www.pcn123.net>, 2016年7月6日访问。

③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④ Thomas Kuh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115;转引自宋志润:“知识演化与生物进化的类比:库恩的后达尔文思想评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9期,第20-24页;也可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

⑤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3页。

⑥ 苏长和、彭如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年来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反思”,第15-20页。

主要受到以下五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卓越的学派领袖、优秀的学术团队、坚定的思想信念(例如芝加哥学派对实证主义的信念、罗切斯特学派对理性选择的坚守)、革命性的学术影响和(大学)行政中枢的支持。^①本文认为,在诸种因素中,能够支撑学派兴起和传承的决定性因素是共同的信念。行政中枢的支持往往意味着财政和组织资源,但行政支持并不构成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强大的学术团队和革命性的学术影响是孪生兄弟,同时又是学派生成的结果。不仅如此,世界级名校的政治学系几乎无一例外有着强大的学术团队和重要的学术影响,但并不因此都成为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学派”,比如今天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卓越的学术领袖对于学派的启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学派甚至以领袖来命名,比如政治哲学领域有所谓的“斯特劳斯学派”(the Straussians)。^②然而,学术领袖履行着行政领导和学术思想领袖的双重职责。如前所述,行政支持本身构不成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学派领袖与通常的政治学系主任或顶尖政治学者的本质区别也不在于其绝对的学术贡献和影响,而是坚定的学术信念。学派的生成和繁衍实际上是对开山领袖学术信仰的继承和发展。换言之,如果学术共同体缺乏坚定的信念,即使同时具备行政中枢的支持、强大的学术团队、巨大的学术影响和卓越的学术领袖,仍然形不成“学派”。后文将要重点阐发的“观念引导路径”即是对共同信念或观念如何促成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生成的论证和引申。

关于学派如何生成,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突出“核心概念”。孙学峰等在评价成长中的“清华学派”时,把缺乏“核心概念”视为学派尚未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实际上,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核心概念要么被用作自变量,要么是因变量。所以,核心概念是形成核心问题的前提。例如,形成中的“清华学派”就旨在回答“霸权国家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演化”这一重要问题。^③

第二种观点强调系统的方法或方法论。张锋坦言,以阎学通为代表的清华学者是

① 参见卢凌宇:“美国政治学学派生成的条件分析:以罗切斯特、芝加哥和耶鲁学派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5日;也可参见张家治、荆润川主编:《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学派》,第23-24页;艺衡主编:《学派的天空: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群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关于学派生成的其他影响因素,可参见[美]肯尼斯·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梅仁、王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6-30页;Morton Kaplan, “A Great University Makes for a Great Depart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 803。

② “斯特劳斯学派”(the Straussians)是以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来命名的。这种学派命名方式较为少见。关于“斯特劳斯学派”的概况,可参见Kenneth Deutsch and John Murley,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包利民:“《罗尔斯篇》与古今之争的得失:试论斯特劳斯派”,《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第45-51页;朱兵:“一位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肖像:哈维·曼斯菲尔德政治思想初探”,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3页。

③ 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第18-32页。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很有特色、颇具发展潜力的一支。它以中国先秦思想和实践为经验基础,目的是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当前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强调科学方法的应用。尽管如此,张锋坦言上述三个特征还不足以支撑起“清华学派”,因为“一个学派必须在一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法与观点,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①这个观点与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看法相呼应。斯蒂格勒曾指出,如果一个学派统一于研究方法而不是实质性的原理,那它的寿命将更长。方法论并不局限于实质性的问题,因而学派的成员能够更容易地适应新问题和新的挑战。^②但是后文将要论证,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是同构的。在很多情况下,本体论和认识论决定了方法论和方法的选择。换言之,方法论是表,本体论/认识论是里。同一方法(论)可以用于研究不同的核心问题,未必具备支持学派生成的独立性。

第三种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是秦亚青的观点,即强调“核心问题”。国内其他学者未必赞同单一的“中国学派”这个提法,但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赞同核心问题对于学派形成的驱动作用。秦亚青首先把国际关系学定位为经验科学。经验社会科学是问题驱动的,其理论贡献在本质上就是对某个研究问题的回答。从这个前提出发,秦亚青指出,中国学派建构的起点和关键是提出有价值的核心问题。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是基于又不囿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原创性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就是对某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具体而言,理论的核心问题主导一个特定行为体的研究议程。它引导出核心理念,然后“从核心理念形成理论硬核,从理论硬核发展成理论范式”。秦亚青还辨识出“美国学派”的核心问题为“如何保护和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主权国家体系在缺少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核心问题的差异取决于二战之后两国的历史地位和面临的问题不同。这种差异性“通过英美两国社会文化表象系统的折射,显示出质的差异。它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体系,使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社会;使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体系的霸权护持,使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社会的建构与运作;使美国人更加注重软硬实力,使英国人更加注重规范与规则”。通过类比,秦亚青提出“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很有希望催生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③

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得到了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赞同。卡赞斯坦虽然

① 张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4期,第127页。

② [美]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贝广多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66页。

③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4期,第165-176页。

“很怀疑在解决问题上(或自变量)存在特定的国家学派”,但他表示“确实相信某些学派产生于特定社会之相互联系的问题群(或因变量)”。^①不仅如此,核心问题引导路径在国内学术共同体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多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经常受到批评,被指“连问题也要从国外引进”。^②理论建设要来自现实中的重大问题,^③所以,“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前提”。^④

综上所述,核心问题和共同信念是最具包容性和潜力的学派生成路径。接下来,本文首先进一步讨论“核心问题驱动路径”的特点和限度,然后再论证“观念引导路径”的合理性和不足。

二 核心问题的类型与学派的生成

对于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这个论题而言,秦亚青教授的贡献在于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驱动路径”以及实现这条路径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要让这条路径为中国本土国际关系学的成长做出切实的贡献,仅仅依赖纲领性的原则是不充分的。后继的学者有必要将秦亚青教授提出的若干原则细化,深入地探讨核心问题推动学派生成的特点和限度,这样才能赋予这个创见以可操作性。本文在秦亚青原创性贡献的基础上提出,“核心问题驱动路径”能否顺利贯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具体来说,经验性问题而不是规范性问题更有助于该路径的实现。而且,无论核心问题的性质如何,这条路径还面临着“泛目的性”、问题的阐释性和集体行动问题等约束。对于以国家命名的学派,情况尤其如此。

诚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包括核心问题在内的任何研究问题都有不同的时空走向。根据问题的时间向度,研究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经验性问题(A类);二是规范性问题(B类)。经验性问题是针对经验性事件的提问。经验性事件分为两种:一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现象或事件,例如古希腊时代斯巴达、雅典以及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对峙的“两极格局”。二是普遍性的现象或事件,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缓解,但不可能完全解决,比如曼库·奥尔森(Mancur Olson)

① 任晓:“关键在于中国特性:也谈英国学派及其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70-71页。

② 任晓:“国际问题研究断想”,《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第51-53页。

③ 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卷首语。

④ 张志洲:“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前提”,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9页。

所提出的集体行动问题。^①相反,规范性问题指涉未曾发生的现象或事件,主要有以下两个子集:^②一是尚未发生的事件,比如打破美元单一霸权的世界经济秩序。二是应然性事件,比如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应然性事件与尚未发生的事件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对于某些主体而言,尚未发生的事件很可能就是应然性事件。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张。

参照上述核心问题的类型学,不难发现,美国学派、英国学派与秦亚青教授所建议的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美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在二战中确立的国际地位以及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则是“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引导中国学派生成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则是“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③美国的霸权护持行为始于二战结束,而英国所谓的国际社会的形成甚至早于1945年,两者虽然也指向未来,但都已经发生并且正在继续,因此可以视为经验性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个问题则既可以视为经验性问题,又可以视为规范性问题,两者分野取决于所谓“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这里牵涉到三个关键词:一是“和平地”;二是“融入”;三是“国际社会”。如果说“和平地”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融入”指成为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际社会”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主要的国际组织,那么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相反,如果把关键词的外延窄化,比如把“和平地”界定为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那么鉴于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样的事件,我国即使已经“融入国际社会”,但却不是“和平地”,至少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是如此。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核心问题符合秦亚青教授所强调的核心问题的“目的向度”,体现出前瞻性,能够“代表人类发展的需求和进步方向”。^④快速崛起的中国的目标是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也应当并且能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鉴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体量,“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由于该问题本身可能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所以无意中掩盖了两类问题的

①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② 规范性问题还有一种形态,那就是区别于现实文化的所谓“书面文化”,可以参见顾准:“论孔子”,《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395页;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248页。

③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65-166页。

④ 同上,第165-166、174-176页。

区别及其在促成中国学派成长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单纯的规范性问题或许难以成为承载催生中国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规范性问题具有高度的可变性。

规范性问题难以控制的可变性源于这类问题的所指是未来,因而不确定的。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来说,“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显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代表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外交的总体方向和趋势。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假问题。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资本主义阵营还未能完全从二战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两大阵营旗鼓相当。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资本主义发动攻势,争取实现世界革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6月23日的讲话中指出,虽然中国讲和平、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他强调:“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①另一方面,可以设想,对于21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可能仍然是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但也可能不是。到时候它是个什么类型和层次的问题取决于今后六十多年国际政治、经济和人类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所以谨慎地说是难以判定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是到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平地融入了国际社会,获得了与之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 cultural感召力相称的国际制度话语权。

前瞻性的核心问题存在着不确定性,原因在于这样的问题受政策影响很大。换言之,这种不确定性内生于理论所具有的“实践”向度。相较之下,历史性问题针对历史事件或现象发问,这样的事件或现象都存在过;普遍性问题(比如集体行动)所指涉的事件或现象则在过去、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都存在。未来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源于国际关系的长远趋势难以预测,而人类发展的大势之所以难以预测,则主要源于两个因素:第一,政治社会发展大势的影响变量过多。国际关系中只有少数问题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但其代价也是昂贵的。为此,需要在模型中加入尽可能多的变量,而出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从来都是简约的,因此,社会科学预测往往是“反理论”的。^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熟的社会科学都是历史学。鉴于此,前瞻性核心问题有可能掉进发明问题而不发现问题的陷阱。第二,国际关系学家往往只是解释或阐释历史,而不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532页。

^② 卢凌宇:“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2-154页。

塑造或改变历史,后者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职能。卢凌宇和章远论证了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理论家只能强化而不能矫正政治家的政策偏好。^①另一方面,保罗·安维(Paul Avey)和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对布什父子和克林顿政府的234位外交和外事官员做了问卷调查,发现其中虽然有68%的官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给他们提出了决策的思想基础,但却又只有12.6%的官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工作中得到直接的运用。对于国际关系学的证据(evidence),这两种功能的比例分别为71.4%和12%。而且,官员们普遍反感采用前卫科学方法的国际关系著作。比如,温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费伦(James Fearon)这些在理论界最具影响的学者,几乎完全在决策者的视野之外。^②

规范性问题的一个变种是在逻辑上自洽,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现象或事件。“关系主义”是颇具代表性的中国原创国际关系理论。它的核心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关系(guanxi)如何影响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关系主义”具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和强烈的中国文化意识。该理论的创建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是“关系性”。它是区别于个体理性的关系理性,强调主动创造最优共生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界定和实现最大可及利益。“关系主义”做出了三个基本假定:一是人们在共在关系框架中追求最大可及利益,而不盲目追求并不现实的纯粹个人利益;二是人们主动创造最优共在关系,以求改善自己所处的共在关系结构和利益实现环境;三是人们可以接受儒家“体仁行义”的现实选择,务实推动最优共在关系的构建。^③显而易见,三个假定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结构:如果人们不盲目追求纯粹的个人利益,那么必然要兼顾所共在的社会关系,而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强调的恰恰是重集体轻个人。然而,从经验和实证的角度来看,“体仁行义”的主张在国际关系史的哪个阶段或者范围实现过?如果从未实现过,它只不过是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理想而已,是指向未来的,很难发育成经验社会科学的理论流派。

三 经验性问题与学派的生成

经验性问题是核心问题的另一种类型。本文认为,经验性问题更有助于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的生成。秦亚青强调中国的原创性理论不仅要具备地域上的社会实践性,

① 卢凌宇、章远:“理论如何影响政策?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第34-51页。

② Paul Avey and Michael Desch. “What Do Policymakers Want from Us? Results of a Survey of Current and Former Senior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ak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2, 2014, pp.227-246.

③ 参见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116-138页。

而且必须具有“超出局部传统和经验的通则性”。^①但无论原创性理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问题最好具有较强的经验背景或基础。上文提及,经验性问题可以是历史上的,也可以是现实的或者从古至今都存在的。“如何避免国际战争尤其是大国战争”就是一个人类在历史上、现实中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面临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

西方政治学的罗切斯特学派以理性选择理论著称,同时也可以视之为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分支。^②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理性经济人如何做政治选择”,这里的“政治选择”可能是投票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该学派的基本假定、原理和分析方法工具都借自微观经济学,目的是以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政治人的行为。它通过研究集体决策或政治决定的过程和结构,探索理性选择如何影响政治过程,涉及政治过程的各个方面,如立宪、立法、行政与司法。^③公共选择学派崛起的时代背景是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因此该学派也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该学派提出的核心问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普遍性:自从人类开始有组织地生活,如何行使公共权力就是一个伴随始终的重大问题。

已经或正在生成的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学派都致力于回答经验性问题。例如,作为冷战后崛起的欧洲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赫流派,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安全分析方法——安全化理论成为冷战后安全研究议程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性概念与理论。^④这个学派的核心问题可以认定为“安全化如何影响世界政治”。在当代世界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存在,并且可能越来越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也具有厚重的经验性成分,其实证基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他们通过借鉴荀子的“王”、“霸”、“强”三分法,指出体系主导国的性质决定国际规范的演化方向,而其自身行为是影响国际规范演化的主要路径。^⑤相应地,“清华路径”的核心问题可以理解为“霸权国如何影响国际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65-166页。

② 公共选择理论公认的学派有三个: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参见方福前:“当代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三个学派”,《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31-36页。

③ 孙裕生:“评公共选择学派”,《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第61-67页;谢舜龙:“公共选择学派评析”,《统计与决策》2003年第11期,第96页;吕建华:“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学习时报》2003年11月3日。

④ 所谓“安全化”指这样一个过程,其间某些问题被行为主体认定为威胁。一旦这些说法被某些听众接受,他们就有权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采取紧急措施并证明这些措施即使超越了常规政治程序但仍然不失其正当性。参见叶晓红:“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第164-171页;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1-26页。

⑤ 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8页。

规范的演化方向”。清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要由路径成长为学派,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除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以及提出“以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成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之外,^①还包括要在春秋战国以外和之后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找到新的经验土壤,也就是令人信服地验证,其核心命题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独有的现象。当然,即使如此,也不妨碍清华学者的独具一格,但缺乏更广泛的经验基础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理论的外延,使之难以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

生成中的“上海学派”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②其中之一就是实证基础不清晰。“上海学派”的核心问题可以推定为“共生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我们假定东亚朝贡体系是共生国际关系体系的典范,^③问题是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朝贡体系之外,国际关系史上还存在过类似的“共生体系”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共生理论就只能解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亚朝贡体系内的国际关系。这样的话,说“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就是典型的规范性表述了。^④类似地,有关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如新兴国家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全球共生文明共生意识和中国的崛起会促成共生型国际关系的观点,^⑤就更像是预测或展望,其实证基础仍有待观察。

简言之,规范性问题和经验性问题之间的分界线在于当前这个时间点。如果问题完全指向今天之后或者未来,就是规范性的,反之则是经验性的。但抛开规范和经验的区别不论,要通过“核心问题驱动路径”来建立中国学派,可能还不得不解答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第一,“核心问题”的认定很可能存在“泛目的性”。秦亚青教授明确指出,“核心问题引导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150多年来,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最大问题是认同困境。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观念变化使我们第一次开始比较成功地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围绕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会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⑥所谓“必然会导致”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学者们会围绕着核心问题采取集体行动。这就赋予了文化选择以

① 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第18-32页。

② 关于共生理论的基本论点,可参见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第8-13页。

③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任晓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155页。

④ 袁胜育:“共生型国际关系:理论与挑战”,任晓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第199-200页。

⑤ 同上,第195-207页。

⑥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9页。

合目的性。但是按照波普尔的逻辑,研究问题的产生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难以科学、逻辑地理解。^①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对于学者而言,研究什么是文化选择,是人“有意识”地思想和行为的过程。^②尽管如此,不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比如采访和问卷调查),我们很难确证,学者们选择某个与核心问题具有亲缘关系的研究问题,是出于政治上的“合目的性”。

如果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某一问题是出于无意识的目的性,那么在缺乏实证支持的前提下,不能轻易地排除“泛目的化”的可能性。“泛目的化”的要点在于从果推因,是“反向工程”,即从已完成的工程的产物出发去推断其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过程。按照郑也夫的观点,“泛目的性”根植于人类理性的反思精神。理性倾向于“将人的很多行为披上了意图和得失计算的外衣,其实很多决策是情感完成的,其中几乎没有意图和得失的考量”。相应地,理性在解释人类历史时,常常将“目的”注入其中。^③学科发展史是广义的人类思想史的内容,思想史是人类历史的子集,难免受到“泛目的论”的影响。

秦亚青教授在此处的论证借鉴了考克斯(Robert Cox)的权力知识理论。考克斯认为,理论总是在为某种目的服务。通过以时间和空间特征对理论问题加以定位,可以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目的性特征,即旨在解决西方战后面面对的各种问题,维持西方主导的世界性权力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各种关系。^④秦亚青与考克斯的区别在于,考克斯强调研究人员意识的目的性,但秦教授表示目的性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的服务功能”。^⑤“无意识的服务功能”的困难之处在于它很难验证,充其量只能视之为又一个基本假定。假定此功能是存在的,同时也就假定了特定的社会知识结构对于人的意识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假定就更大胆了,但是同样难于验证。

不仅如此,国际关系某些学派的“核心问题”似乎不是政策性的“合目的性”所能解释的。北欧学派即是一例。^⑥吴志成和杨娜在论及这一区域和平研究的兴起时指出:“一方面在于北欧国家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优势,面临的武力威胁较小,和平成为这一地区的主题;另一方面,北欧国家普遍较为富强,政府与教育部门重视发展国际关系学,充分的资金投入促进了国际关系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学派的兴起需要行政和

① 然而,至少对于经验科学而言,研究问题的生成并不必然是非理性的、无法追踪的过程,参见卢凌宇:“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61-74页。

② 张开:“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扬弃:人类社会的文化选择”,《理论学刊》2013年第8期,第67-73页。

③ 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第299-302页。

④ [加]罗伯特·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⑤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70页。

⑥ 吴志成、杨娜:“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第83页。

财政上的支持,这一点毫无疑问。另一方面,所谓和平研究只不过是硬币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就是战争或冲突研究。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刊登的论文几乎都以战争/冲突为自变量或因变量。从逻辑上看,北欧地区承平日久,如何制止战争显然不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心。相应地,学者们也不应对战争和冲突予以如此多的关注,而是应该更多地关心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问题。

第二,即使以同样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为经验基础,也很可能提出不同的核心问题,所以核心问题的认定具有较强的阐释性。秦亚青教授把“如何护持霸权”视为美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无论是二战后初期兴起的新现实主义,1979年之后崛起的新制度(自由)主义,还是冷战后出现的建构主义,都服务于这一核心问题。它们的回答针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国际地位和政策导向的变化,即权力霸权、制度性霸权和文化霸权。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①实际上,三大主义远远不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部。相对于1980年代之后逐渐兴盛的实证主义政治学和日渐多样化的研究议程和纲领,三大主义在当代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学中实际上是相对边缘化的。^②由于论文篇幅的限制和集中论证的需要,秦亚青教授并未触及这一问题,只是指出这些国际关系学“研究问题趋同”,“理论流派五彩纷呈”,虽然具体问题和理论假设各不相同,但是“关注的都是相同的核心问题”。^③

研究问题和核心问题的认定会由于研究者视角的不同,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面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观察,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所要回答的,并不是一个地区/国别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很强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国家间尤其是大国战争(冲突)。当然,三大主义提问的时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分别针对二战后早期的均势和平、1970年代的缓和时期以及两极格局的和平瓦解。它们的理论家只是对同一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分别是大国权力分配、国际机制和国际文化。也就是说,三大主义问了同一个问题,但做出了不同的回答。^④尽管如此,问题本身超越了提问者所处的时代,从而具有很强的普遍性。换言之,核心问题的认定不是唯一的,而是有着较强的阐释性质。学者们或许研究类似的具体问题,但他们未必会认同一个所谓的“核心问题”。

①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第61页。

②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3. 参见此手册的目录。

③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70-172页。

④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第61页。

对于拟以国家/地域命名的学派来说,“核心问题驱动路径”还面临着另一个困难,那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会导致学派“断裂”。“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都是对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自1919年现代国际关系学建立以来,这个学科在两个国家的发展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说核心问题是国家特定阶段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的映射,那么,英国和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当代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不一样的。^①如果核心问题是识别学派的标准,那么,由于美英两国在二战前后的国际地位迥然不同,面临的核心问题自然也不一样,所以不宜将它们泛泛地称为“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

四 观念与学派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解释,“中国学派”是一个理论集合体,类似于一个中国特色的研究纲领。理论作为一个系统,其生成始于一个核心。这个核心称为理论的硬核,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另外一种理论的根本标志,是理论的灵魂所在”。^②在伊雷姆·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理论的硬核是“不可改变的、特权化的知识”。^③埃曼夫妇(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指出,新现实主义的硬核至少有七个,包括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自助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则,以及生存是国家的首要考虑,等等。^④换言之,理论硬核的本质是一系列关于人和世界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而理论的基本假定往往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观念。

观念是人“关于某方面的认识和觉悟”或者“客观事件在人脑中留下的概括形象”。^⑤外交决策分析的“操作编码”(operational code)学者提供了观念的类型学标准,^⑥将之分为哲学观念和工具观念。前者类似于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或人“对世界总

①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第61页。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66-167页。

③ [美]伊雷姆·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174页。

④ 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 “Lakatos and Neorealism: A Reply to Vasquez”,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p.924-925.

⑤ “观念”还有一个意思是“思想意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在线版,<http://cidian.911cha.com/MWYwY3c=.html>,2016年7月7日访问。

⑥ Alexander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ld’: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p.190-222. 也有别的观念分类标准,例如,戈尔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按照观念对人类行为指导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将之分为三种:世界观、原则化观念和因果信念,参见[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息、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3页。

的观点和看法”,^①其功能是指导诊断行为场景;后者的作用是提出最有效的战略和策略。世界观代表了人对有关世界和人生的基本问题的回答,而基本问题会在特定的“问题域”中起“规定作用”,决定该域中全部问题的特殊性质。^②类似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下观察问题 and 处理问题”的。世界观不同,对事件的应对和处理的方式方法也就不一样。

具体到国际关系学中,哲学观念往往指涉学者们在科学研究中所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而工具观念则指涉方法论或方法选择。如前所述,有不少学者强调方法论或方法对于学派生成和维持的重要性。例如,斯蒂格勒指出,如果一个学派统一于研究方法而不是实质性的原理,那它的寿命将更长。方法论并不局限于实质性的问题,因而学派的成员能够更容易地适应新问题和新的挑战。^③类似地,有学者认为“一个学派必须在某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已建立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法与观点,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④实际上,方法的选择是受理论基本假设(本体论)和认识论支配的。有学者基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考察发现,在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的假定与定量研究方法,以及建构主义的假定与定性方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对应关系。比如,几乎找不到使用定量方法的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⑤詹姆斯·玛洪尼(James Mahoney)和加里·戈尔茨(Gary Goertz)进一步指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文化,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的约束。它们在解释方式(approach of explanation)、因果关系(causation)、多元解释以及概念和度量等方面都背道而驰。例如,从解释的途径来看,定性方法重在解释个体案例,强调结果产生的原因,而定量分析则关注独立变量的平均结果,注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⑥把这个区别追溯到认识论,那就是实在论与工具

① 参见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杨友成:“科学世界观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较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论辩”,《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第3-9页;孙正聿:“怎么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3-9页;俞吾金:“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第3-10页。

② 孙正聿:“怎么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第3页。

③ [美]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第166页。

④ 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第29-31页。

⑤ 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Tierne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1, 2009, pp.6-33.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这种对应关系既非自然,也不明显。它并不是必然的,也非价值驱动,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系统学术训练和学术发表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1, 2009, pp.58-71. 这个观点的基本假定是观念早在学术发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⑥ See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A Tale of Two Cultures: Contras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Political Analysis*, Vol.14, No.3, 2006, pp.227-249.

主义的差异。^①所以,可以认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同构性。出于行文的方便,本文中将它们统称为“观念”。

前文论及的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本体论是理性经济人。交易政治学是其另一个基本假定,认为人类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可以视作其认识论,由于政治活动的本质是公共选择,并且在此过程中个人的目的是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那么政治只不过是更复杂的交换,所以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政治过程。方法论个人主义则是其方法论特征,强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从个体来理解,这与理性经济人的本体论相符合。

再以英国学派为例。从核心问题的视角来看,英国学派围绕着“国际社会”这个核心概念展开。从观念的角度来看,英国学派的特色“总体上”体现在方法上,区别于“美国注重科学方法,强调理论的超历史特征、价值中立性以及经验实证性”,英国学派“强调理论的思辨性、历史性以及理论必然具有的价值内涵”。^②有学者把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核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支点”,即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以“国际秩序”、“国际正义”、“维系国际社会的因素”为研究支点。“秩序”和“正义”是国际社会的两种基本价值,维系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上述两种价值。^③进一步言之,英国学派的选题和方法取决于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本体论共识或基本假定。这些观点包括“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和“人类认识能力有限性”。所以,“明确的研究方向、重视本民族话语”以及“走自己的路、重学术传承、锲而不舍与不懈努力”则是基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特征。^④此外,相对于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理性主义主流,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则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比如,就本体论而言,美国强调物质,英国偏重理念;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美国强调科学实在论,英国偏重理性思辨;在方法论方面,美国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元论,英国偏重历史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⑤这些区别不仅是美国 and 英国国际关系学的整体区别,也被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所传承。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

① 卢凌宇、林敏娟:“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74-102页。

②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72-173页;也可参见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3页。

③ 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第15-16页。

④ 王存刚:“可借鉴的和应批判的:关于研究和学习英国学派的思考”,《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52页。

⑤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65页。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美国学派是主流,其特征是使用纯粹科学或硬科学的方法和模型,其分析的基础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即坚持认为知识增长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客观观察和系统(systematic)检验。英国学派则试图超越主流政治学和经济学,重视规范性的研究,绝不满足于所谓科学方法。^①

五 “观念引导路径”的合理性

共有观念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鲜明特征,也是引导学派生成的可行路径。相对于“核心问题驱动路径”,“观念引导路径”的合理性如下:

第一,国际关系学家回避不了观念选择。无论研究者是否有明确意识,永远是被观念驱动的。观念首先体现为关于世界政治的若干本体论原则或称基本假定,以及与本体论相对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罗切斯特理性选择学派的基本假定是政治行为体是“理性地”实施各种行为的。^②这个本体论在方法论上的对应就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相应地,在具体方法上,形式建模和统计分析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外交决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本体论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结构现实主义学派的两个基本观念则是国家是单一的政治体以及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认识论选择,即前者是科学实在论,而后者是工具主义,而对立的方法论/认识论又导向不同的方法选择,具体而言,科学实在论对应的是跨层次分析,而工具主义对应的则是单一层次研究。^③如前所述,政治学理性选择学派也遵循着由本体论到方法论/认识论再到方法选择的路径。研究方法本身会更新,但由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选择是不可回避的,学者们会自然而然地分散到不同的“阵营”。

第二,观念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如果说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会受到国家发展阶段和外交战略的影响,那么,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论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先行”不仅仅是外交决策者的显著特点,^④也是人的本性使然。实

^① Benjamin Cohen, “Comment: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4, No.2, 2007, p.198.

^② Cohen Benjamin, “Revenge of the Nerds”, *The New Republic*, Vol.211, No.16, 1999, pp.14-16.

^③ 卢凌宇、林敏娟:“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第74-102页。

^④ 卢凌宇、章远:“理论如何影响政策?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第34-51页。

验政治学验证了观念强大的惯性。^① 朱迪斯·戈尔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观念改变的前提是“被事实所怀疑”,或者出现了更具说服力的强大观念。^② 但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弗里德曼夫妇(Milton Friedman and Ross Friedman)的洞见表明,人并不会轻易地被事实或相反的观念所说服,反而倾向于顽强地捍卫自己的观念。比如,科斯注意到数理工具的盛行导致了经济学研究中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同样的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经验发现。科斯的结论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中,理论在统计调查进行之前就已存在,而并非从调查中产生。”^③ 统计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检验而是证实既有理论。早年的弗里德曼坚信经济学家的政治倾向取决于实证观点(证据),这也是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这篇经典论文的认识论基础。^④ 但是,到了老年,弗里德曼日渐接受妻子罗斯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学家的政治倾向决定其实证观点(证据):“一些被我视为科学发现的观点不断地受到抨击,抨击我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更多地受他们的价值观的驱使而不是客观判断的驱使。”^⑤

凯恩斯早就深刻地指出,对于人的行为来说,思想的逐渐侵蚀远比既得利益的力量强大得多。具体而言,“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们所能运用的理论不大可能是最新的。”实验心理学的很多研究成果支持了凯恩斯的观点。比如,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事件。人们如果持有某种信念的话,会想方设法为他们的信念辩护。^⑥ 这个现象制造了一种客观性(objectivity)的假象。^⑦ 这种客观性之所以是虚假的,原因在于:为固有观念辩护时,是受到偏见激励的。人们有选择地在记忆里寻找能够为自己的愿望提供支持的论据,在面对相反的信念时更倾向于接触和使用支持性

① 例如 Craig Andersen, Mark Lepper, and Lee Ross,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 The Role of Explanation in the Persistence of Discredite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39, No.6, 1980, pp. 1037-1049; C. Andersen, “Abstract and Concrete Data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 When Weak Data Lead to Unshakeable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9, No.2, 1983, pp.93-108。

② [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第17、25页。

③ [美]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7页。

④ 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p.3-16, 30-43。

⑤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韩莉、韩晓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7页。

⑥ William Klein and Ziva Kunda, “Motivated Person Perception: Constructing Justifications for Desired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28, No.2, 1992, pp.145-168。

⑦ T. Pyszczynski and J. Greenberg,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ference: A Biased Hypothesis-Testing Model”,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20, No.1, 1997, pp.297-340。

的证据。

学者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观念所具备的高度稳定性,是学派生成的强大思想基础。罗切斯特学派的生成和繁荣印证了这个观点。罗切斯特学派的理性选择路径是以芝加哥学派领袖查尔斯·梅里姆(Charles Merriam)所推崇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只强调统计相关性和经验检验,但缺少对于人类行为的公理性假设和能够产生普遍规律的最小化假定。^①相反,威廉·莱克(William Riker)的理性选择并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根植于关于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假定,那就是人们在“可靠地、理性地实施行为”。^②莱克的这一信念形成于青年时代。早在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前,莱克就对当时流行一时的个案研究方法表示严重质疑。到了1950年代中期,莱克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政治联盟理论》一书。^③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的学者都认同莱克的思想。由于观念的一致性,罗切斯特学派被誉为牢不可破的军团(esprit de corps)。在罗切斯特政治学系诞生十年之后,系里只流失了克莱默(Jerry kramer)和古登堡(Arthur Goldberg)两位教授。^④相比之下,耶鲁学派即使在巅峰时期也在不断地损失知名教授。在1955-1970年间,只有多伊奇(Karl Deutsch)和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还在那里。可以认为,集体的价值或信念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学派的生命决定性地依赖于一个集体如何坚守特定的价值或信念。^⑤

第三,观念共同体的集体行动成本最低。人类的绝大多数选择都是有目的的。但正因为人类行为广泛存在的目的性,集体行动就变成了人类群体生活最大的挑战。假定“核心问题驱动路径”下学者们在做问题选择的时候怀着有意识的目的性,那么如何促成集体行动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若非观念契合,学派领袖要在学术团队推进他所倡导的研究纲领难度很大。清华团队目前所处的一个重大困境就是其研究纲领乏人跟进:前期工作“参与人员较多,士气高涨,成果较多”,但从2011年起转入“创新阶段”后,“团队发表的论文明显减少,亦有不少成员转向其他研究领域”。孙学峰等把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归咎于学术创新比学术梳理难度大,只有后者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前者只能靠具有独特能力的少数人来解决,“特别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① S. Amadae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Rochester School: 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Annual Reviews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 No.1, 1999, p.272; Kristen Monroe, “The Chicago School: Forgotten But Not Gon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1, 2004, p. 96.

② Jonathan Cohn, “Revenge of the Nerds”, *The New Republic*, Vol.211, No.16, 1999, p.4.

③ S. Amadae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Rochester School: The Origins of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pp.276-279.

④ Ibid., p.280.

⑤ 杨龙:“评公共选择学派的三大理论假设”,《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2期,第54-59页。

的能力”。^①为了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清华团队亦曾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吸纳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但应者寥寥。相反,观念选择是个体的内生行为,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往往形成不约而同的集聚效应,因此即使不能说不存在集体行动问题,其集体行动的成本也比“核心问题驱动路径”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念引导路径实乃知识生成和演化的自然路径。

如前所述,自然演化与人为建构并不必然矛盾。“观念引导路径”的缺陷和短板,恰恰可以被人为建构所弥补。在“观念引导路径”下,理论学派的生成是散漫、渐进和无形的,发展和成型很慢。一个潜在的学术共同体从共有观念出发,致力于某个或者某些问题的研究,到一定时候,这个共同体会逐渐成形,形成合力,学派最终水到渠成。在这个过程启动的时候如果能够产生出引领学术潮流、凝聚观念共识的学术精神领袖,学派生成的效率会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没有莱克的首善之功,理性选择的政治学派未必会形成于罗切斯特大学,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地在罗切斯特大学生成。耶鲁学派得以进入鼎盛时期,也有赖于达尔(Robert Dahl)这位学术领袖的强大号召力。

此外,芝加哥学派和耶鲁学派的衰落,主要原因是由于观念分裂或衰落,无力再凝聚思想共识。这些经验反证了观念对于学派生成和维持的重要性。以“核心问题”来辨识学派是秦亚青教授的贡献。在此之前,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以观念来认定学派,比如罗切斯特学派的“理性选择”、耶鲁学派的“多元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经验主义”。施蒂格勒就指出,科学中的学派是认同一门科学中的某个(些)观点的科学家的集合。^②

耶鲁学派的信念是多元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多元主义强调“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概念和可检验的结果”。吊诡的是,正是多元主义本身导致了耶鲁学派在 1960 年代末的衰落。在多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耶鲁学派内部分别形成了以达尔、莱因(Daniel Lein)和多伊奇为首的三个泾渭分明的集团。他们各自为政,很少互相往来。多元主义也受到社会变革的挑战,例如抗议越南战争和纽黑文的城市骚乱,都导致了大量的批评。^③

梅里姆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德高望重,但他坚守的信念始终未能定于一尊。虽然同事们为“光辉的事业和伟大的同志友谊而感到骄傲”,他们并未放弃自己固有的

① 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第 29-30 页。

② [美] 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第 165-166 页。

③ Richard Merelman, *Pluralism at Yale: The Cul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p.37-39, p.45; Rogers Smith, “Book Review, Pluralism at Yale: The Cul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 849.

信念。^①有两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一是梅里姆和声名卓著的摩根索在政治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学科现状和未来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例如,梅里姆相信进步主义哲学,但摩根索坚持认为人性本恶,社会工程于事无补。^②甚至在国际关系学科内部,摩根索和赖特也观点相左,一个反科学方法,一个支持科学方法,撕裂了学派。^③二是政治哲学大家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他相信政治哲学经典是万能的,对于梅里姆推崇的经验研究不屑一顾,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出色的学者。^④这些裂痕分散了学派的力量,对于学派在1940年代末的衰落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耶鲁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由于观念分裂而衰落,清华团队则在学派成形之前就受到观念分歧的困扰。清华团队出现了侧重思想和历史两种研究取向,尚未能“在某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已建立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法与观点”。孙学峰等坦陈,“两者的融合很困难,还需要一些时日”,并认为“清华路径”上升为“清华学派”的关键是“以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成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如此,清华团队还在认识论上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思想与当前国际关系具有相似性。^⑤鉴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构性,清华团队的内部分歧很可能是团队成员无法在世界观和本体论上达成共识。

结 论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5月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习主席特别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但我们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还很欠缺,与我国崛起

^① Herbert Simon, “Charles E. Merriam and the ‘Chicag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Edmund James Lecture Delivered on October 10, 1985, pp.8-9.

^② Kenneth Williams, *Schools of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preters, Issues, and Morality*,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96, pp.21-26.

^③ 汤姆森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芝加哥学派最辉煌的年代(20世纪40年代晚期、50年代和6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摩根索和赖特两人的存在”。参见[美]肯尼斯·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第12-25页。

^④ Gabriel Almond, *Ventures in Political Science: Narratives and Reflection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2, p.70; Kristen Monroe, “The Chicago School: Forgotten But Not Gone”,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2, No.1, 2004, pp. 95-98.

^⑤ 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第29-32页。

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不相称。^①

国际关系学是关照天下的学问,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学问之一。建构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响应习主席的号召,为我国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尝试。科学学派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重要标志”。学派的出现与繁荣,“预示着一个国家进入了思想活跃的文化大发展时期”。^② 国际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将成为中华民族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本文的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是深化秦亚青教授首倡的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生成的“核心问题驱动路径”;二是提出区别于“核心问题驱动路径”的“观念引导路径”。应该说,“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充分地传承了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那就是对实践的高度重视,“始终将自己的双脚牢牢地踏在实践的大地上”。^③贯彻核心问题路径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被绝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喜欢和接受的全局性的研究问题。正如唐小松所言,在尝试创建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特色的理论要成为什么样的理论。^④与此同时,可能不得不解决建立和巩固学术共同体这个集体行动问题。“观念引导路径”则强调具有相似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取向的学者自然演化成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意味着我们只需要认真地致力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假以时日,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自然瓜熟蒂落。当然,从经验上看,学术精神领袖对于学派的形成和维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和“观念引导路径”取向不同,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而言,却有着相同的启示,那就是我们有必要把理论和政策区别开来:理论是中立的,是人类共享的非物质性公共产品,是天下之公器,而政策却是利益和价值取向的,是针对国家的特性和需求制定的。^⑤所以,中国学派的理论或许很难把实用性对策研究的成果积累作为支点。而且,上述两条路径既可以并行不悖,又很可能有交集。如前文所述,秦亚青教授以核心问题来认定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就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这个分野而言,通过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仍然可以清晰地区分。唐小松就认为,英国学派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人文主义方法论。^⑥如果说前者是方法论的特征,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016年10月2日访问。

② 艺衡主编:《学派的天空: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群落》,“序言”,第1-4页。

③ 吾淳:《中国思维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0页。

④ 唐小松:“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27页。

⑤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第292-293页。

⑥ 唐小松:“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第26-27页。

那么后者则是本体论的假定,两者相结合,形成了英国学派的识别标志。此外,从逻辑上看,两条路径是可以整合的,其中一个很有希望的领域就是外交决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相较于宏观的体系理论,外交决策分析这个领域更符合中国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它的最基本假定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中国人本主义的“关系”文化传统颇有相似之处。^①它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征是基于史料和逻辑的“过程追踪”,而我国恰恰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学考据传统。而且,外交政策分析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薄弱的环节,在工具主义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的今天,这个领域很有希望成长为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②国际关系知识的增长是渐进的,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学者的先发优势。从知识增长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求异。由于外交决策分析与主流国际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大异其趣,非常有助于中国学者后来居上,较快地形成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最后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本文探讨的是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学派。不可否认,规范色彩深厚的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也有可能形成学派,例如政治哲学的斯特劳斯学派。在中国,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学说^③就有潜力成为国家关系哲学中国学派的核心和起点。如果目标是建立(国际)政治哲学的中国学派,我们就会遵循很不相同的逻辑,形成大异其趣的愿景。

(作者简介:卢凌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关于“关系主义”,参见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因素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第116-138页。

② 卢凌宇、林敏娟:“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第74-102页。

③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2-33页。